

□孙葆元

邹城市的重兴塔是国内名塔，说它是名塔有两个原因。

其一是它建于北宋嘉祐年间，目前国内建于北宋的塔存留下来的很少，有开封的祐国寺塔、泉州开元寺双塔、洛阳的文峰塔、苏州的虎丘塔、福州的圣寿塔、丽水的延庆寺塔、福建松江的方塔。这些塔从千年风雨中挺立过来，每一座都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。

其二是重兴塔的建筑风格延续了北宋时期古朴稳重、布局合理、风格朴素的审美特点。塔通体为八角形楼阁式样，有九层高，寓意“九天之重”，有十道琉璃塔檐，喻示事物完备与极致。

重兴塔通高27.4米，基座设四个门，东、南、西为佛龛，唯有西门设砖梯可攀，登至二层可见木制环廊，再绕廊至西门可登临远望，鸟瞰邹城市全景。

重兴塔每层檐下都是砖雕斗拱，层级之间别具一格。二层是重檐，三至九层却是单檐，檐下有砖雕莲花做承托，美观至极。重兴塔每层八个立面，立面转角均由磨砖半圆立柱顶承，在视觉上圆润玲珑，没有棱角感。八个立面辟四个门，一至三层的门洞为圆形拱券设计，四至九层门洞却是尖卷装饰，一、二层设盲窗，窗格为波纹状，塔顶铜铸镀金葫芦形宝刹。

邹城市古时称邹县，是一个千年古县，战国时期为邹国国都，同鲁国并称为“邹鲁圣地”。

追寻重兴塔的历史，发现有关史料少之又少。据明代万历年间胡继先修纂《邹志》“庙食志”记载：“重兴寺，在北门内。三十八年知县胡继先重修”。区区十八个字，再无追叙。“三十八年”是明万历年号，为1610年。胡继先是四川人，《邹志》的著作权人写着“邹令蜀人胡继先纂修”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他既能重修重兴寺，为什么不能把重兴寺的历史、过往写清楚些呢？

继续翻阅胡继先编纂的《邹

志》，发现北宋年间有记载的邹县知县、县丞只有四位，其中黄庭坚应该在北宋元丰元年做过一年邹县县令。张文仲为元祐八年知县，朱岳为北宋宣和三年邹县知县，其他年份一片空白，再无北宋时期邹县知县姓名。

邹城古有“八景之胜”，其中“禅塔祥云”就是八景之一。在明代嘉靖年间《邹县地理志》中，有“邹城十二景”的记载，分别为中庸精舍、亚圣名祠、阳山晓日、溪湖夜月、池亭晚照、龙潭暮雨、峰阳孤桐、鬼岭老树、胜地回銮、尼丘毓圣、三迁教子、一经传家，并没有“禅塔祥云”。

为什么邹县有关北宋的史料和记录这么少？撰写方志的历史学家总是穷尽搜索，只能说邹县北宋时期的资料失散了。按照常识，大凡佛塔下必有佛寺，塔是佛寺的组成部分，有不设塔的佛寺，绝没有孤塔立身红尘。现今的重兴塔周边有一片开阔地，在这片地界或者更开阔的地方，方圆内定是重兴寺遗址。重兴寺在北宋名法兴寺，塔以寺名，所以叫法兴塔，塔在元朝坍塌，元至元年间重修，改名重兴塔。

北宋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，儒释道并存，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在此之前大约百年，佛教寺院一直是萎靡的，原因是唐武宗在会昌五年发动了一场灭佛运动，寺院夷平、佛像摧毁，僧人被赶出寺院，史称“会昌法难”。北宋立国后，北宋建隆元年，宋太祖赵匡胤下诏：“诸路州府寺院，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，当废未毁者存之。”从此尽管僧尼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，但是寺院被保护起来。

无论“法兴寺”还是“重兴寺”，名字里都有一个“兴”字，法兴寺是毁佛后百年之“兴”，重兴寺是法兴寺毁祀重修之“兴”。

邹城是亚圣孟子故里，儒风学正，对社会的为善、为恶、为廉有着深刻的见解，乡土罡风、民俗醇厚，佛教与儒教应该有某些有机的融合。

宋代对寺院仍然实行不输课税的制度，所以在宋代僧尼是个抢手的职业，寺庵人满为患，朝廷不得不限制入籍，因此，在宋代，法兴塔应该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。

五百年间，法兴塔几度倾废、几度修复。明万历三十八年胡继先为邹城县令，修复该塔，并纂《邹志》，留下那短短的十八个字，不事夸耀，只做客观记录。遗憾的是，明万历年间，皮匠王森组织白莲教武装暴动，被朝廷镇压。明代天启二年，他的徒弟徐鸿儒揭竿复仇，在河北衡水至山东邹城一带发动暴动，队伍东向，先后攻下滕县、邹县，在邹县大肆掠杀，焚烧了法兴寺，唯留残塔。

如今，经历了千年的重兴塔作为文化遗存坐落在古塔小区内，周边是休闲的广场、居民楼。

邹城是孔孟之乡，查历年县志，对孟庙祠宗的记载溢于篇章，到处都是儒家学子的足迹，因此这座北宋的重兴塔有关史料少之又少就不难理解了。

2013年3月5日，重兴塔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重兴塔显示了北宋时期在建筑技术、材料等方面成就。重兴塔几经修葺，仍保持了其原有的建筑风格，是研究北宋时期建筑历史和佛教传播的珍贵的实物资料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。

(本文作者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

归有光画像

### 史海钩沉

□赵瑞峰

归有光(1507年—1571年)，字熙甫，明代吴郡(今江苏省苏州市)人，文学家，著有《震川文集》等。他曾“八上公车不遇”，被后人推为“明文第一”。

归有光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，他六赴乡试，九上会试，每三年都要照例一番拼搏，三十四岁才考中举人，将近六十岁时才会试及第。归有光曾在第八次参加会试记行时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予自丙申计偕，后七试南宫，来往程及此行，计七万里矣。”这并非夸张之言。在这七万里的路程中，有将近三分之一是走在山东。

归有光北上参加会试及从北京南返，无论是走陆道还是水路，无疑都要从山东经过。对于心性敏感、文名远播的归有光来说，山东路程上的耳闻目睹、苦乐感慨，都在他的笔下得到反映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震川先生集》所录《壬戌纪行》(下称纪行)一文，就是明代嘉靖四十一年，时年56岁的归有光第八次赴京参加会试期间所作的记行日记。他这次北上及南返走的都是水路，在山东停留的时间有二十二天之久。在这二十二天里，归有光每日都写了日记，虽然有详略，但这部分内容几占全部纪行内容的三分之一。

据《纪行》的内容，归有光于前一年腊月二十四走水路自家乡启程，在运河上走了近二十天才进入山东境，这时已是新的一年的正月十二。此后至出山东境，有十天时间是在山东度过的。

时值隆冬，运河结坚冰，又遭雨雾天气，因此归有光走走停停，异常艰难。《纪行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待冰，亭午，始过闸。”“将及南阳，又止。复行。近枣林又止。”“至南旺，汶水流出，冰雪壅河。”“待月聊城，二鼓行……天微雨，止宿渡口。月出，复行。”

偶亦有舟行畅快之时，如在近张秋前，归有光的描述很生动：“近远老口，月出，九船顺风张帆，樯皆挂灯如列星，迤逦行柳树间。”如此壮观的情景，易让人有豪情满怀之感，对归有光来说，“暂忘却营营”，亦是人生难得的快意之事。

这次会试归有光依然败北，他在北京停留至三月初，才带着

复杂的心情离京，仍走水路南返，经过十余日，再次进入山东境。这次他在山东的时间有十二天，此时已是阳春三月，但春天特有的大风、黄沙、干旱天气，加之皇家龙衣船恃封水等，让归有光的山东之行并非一帆风顺。

因此《纪行》中便出现了不同于北上时的写法：“(十六)日，周家店南，水涸，不行。晡时，水至，行。”“十七日，荆门，大风，黄沙蔽天，如行雾中。”“过张秋，及戴家庙，有龙衣船封水。明日，食时行。”“夜，至开河。明日，南旺水涸。”“廿一日，赵村，暴风起，微雨，寻止。过新店，日正赤如血。”

南返乘舟经行山东，途遇名胜古迹之时，归有光也会登岸前往观赏。如舟至武城时，他就上岸观夫子庙像；在南旺，他“至宋尚书祠，观鹅河口汶水来处……有分水龙王庙。”在“济州(今济宁市)，登太白楼”等。显然，归有光只有在南返相对闲暇的情况下能够留意到这些。

《纪行》三月十九日这样写道：“济州，登太白楼……济州西望城武县，正相直也。余曾大父尝为其宰。”归有光曾祖名归凤，字应韶，明成化十年中举，弘治二年选调城武县知县。虽在任时间虽不长，却政简刑清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其政绩深得兖州太守龚弘的赞赏，但其不久因病去官，未能大有作为。此次途经济宁，归有光稍作停留，城武正在济宁以西，这就自然让归有光想起自己的曾祖。

此外，归有光在山东途中还写了不少诗，如登太白楼时所写《登济城望城武》，其中诗句“曾考昔为令，期年化方覃”，可谓对其曾祖治绩的高度赞美。“……竟以未疾返，不及一考淹……西望适相仍，屹立独悲暗”的诗句，既有归有光对其曾祖因病去世，未能大有作为的深深遗憾，亦有自己屡试不第的自伤之意。

除《纪行》文外，归有光还写了《戊南还作》一诗，其中有“半月困漳卫，今日望邹、峰”诗句，他接着写道：“景风时迎舟，积水不盈尺。行路日淹留，归思愈急迫。昔往冒飞雪，今来见秀麦。蕴抱无经纶，徒旅空络绎……”诗句将途中所遇、行路之难、在外之久及会试不遇的苦闷，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。

明嘉靖三十二年，时年46岁的归有光第五次北上会试途经山东，写了《郓州行寄友人》诗：“去年河溢徐、房间，至今填阏之土高屋颠。齐鲁千里何萧然，流冗纷纷满道边。牵挽小车载家具，穴地野烧留处处。丈夫好女乞丐不羞耻，五岁小儿皆能闲跪起。卖男卖女休论钱，同沐之爱忍弃捐……原田一望如落鸦，环坐蹒跚掘草芽。草芽掘见树头秃，归家食人如食豚……”写出水灾之后百姓卖儿鬻女、呼告无路的惨况，表达了归有光对深陷灾境百姓的同情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，年届六十岁的归有光终于考中三甲进士，授长兴县令。在长兴县令任上，他本想有所作为，却得罪了地方豪绅，被明升暗降地调往顺德府任通判。当他乘舟北上再次途经山东时，是否会想起自己数次进京赶考在山东停留的情景？

(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)

